

# 数字时代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及其实现

张海燕

【摘要】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与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我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然而,随着普通法院在线诉讼的常态化适用,互联网法院设立及存在的独特性正在被逐渐消解。关于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存在“技术导向”和“案件导向”的分野,实践中盛行的双导向模式使其与专门法院的建设定位渐行渐远。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双导向模式对互联网法院专业性的冲击以及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逻辑性欠缺等因素共同交织,导致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模糊。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应当是专业审判,这是互联网法院历史沿革和发展动向的内在逻辑,也是数字时代司法改革与互联网空间治理的必然要求。互联网法院专业审判职能的实现路径要在纠偏“技术导向”规则的基础上,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并优化和澄清其案件管辖范围。

【关键词】数字时代;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专业审判;网络治理

## 一、问题提出

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崛起彻底形塑了现代社会人们的交往方式,人类已从以物质为交往基础的工业社会进入以信息为交往基础的信息社会。<sup>①</sup>在信息网络化的数字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互联网技术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产物。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与日俱增的互联网经济规模也带来了互联网领域纠纷的爆炸式增长。海量涉互联网纠纷<sup>②</sup>涌向法院,进一步加剧了法院系统原已严峻的人案矛盾问题。而且,一些新类型涉网法律关系与法律纠纷的出现也使我国的传统法律体系与诉讼制度面临巨大挑战。布里格斯勋爵曾言:“传统法院是工业化时代的结果,而在线法院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传统的法院必将衰落,在线法院必将兴起。”<sup>③</sup>于此背景下,为了顺应社会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的变迁,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互联网司法的现实需求,互联网

张海燕,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 26623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典权利实现视角下民事诉讼程序运行机制优化研究”(23BFX024)、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智能司法视域下民事在线诉讼的理论体系与制度协同”(22RWZD20)和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中的数据运用与数据治理创新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景汉朝:《互联网法院的时代创新与中国贡献》,《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

②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涉互联网纠纷”简称为“涉网纠纷”。

③[美]伊森·凯什、[以]奥娜·拉比诺维奇·艾尼:《数字正义:当纠纷解决遇见互联网科技》,赵蕾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序言,第3页。

法院应运而生。<sup>①</sup> 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该法院试运行一年后,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9月2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先后成立。互联网法院是基于数字时代互联网纠纷的特殊性而设立的,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推进中国式司法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互联网法院作为互联网与司法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通过网上审理解决大量涉网纠纷,旨在为当事人提供更为高效的司法服务,有力推动了诉讼全程电子化、诉讼规则现代化、审判智能化的进程。

然而,随着法院系统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不断深化和在线诉讼模式的广泛普及,普通法院在线诉讼的常态化开展正在逐渐消解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及存在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其表现为互联网法院正面临着审判技术独特性消解、案件管辖范围模糊以及专业性不足等困境。互联网法院难以彰显出对涉网案件审理的独特性。甚至有观点主张其他国家未设立独立的互联网法院,也未因此影响其诉讼程序的电子化。<sup>②</sup> 于此背景下,一个问题跃然纸上,那便是当普通法院亦大力开展在线诉讼时,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的区别何在,互联网法院的未来发展方向应当逐渐与普通法院趋同还是应当有其独特的职能定位?该问题的实质就是互联网法院的职能界定,对于该问题的回答不仅会从宏观上决定互联网法院在整个法院版图中的体系性定位,也会从微观上决定互联网法院作为一个功能性法院的基本制度设计和具体程序规则。鉴于此,本文将通过重新审视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初衷、发展历程,指出其与当下司法现实的疏离之处,进而明晰其应然的职能定位,以及该职能的具体实现路径。

## 二、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之理论分歧

自设立以来,互联网法院运行状况总体良好。然而,长期以来,伴随互联网法院存在的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点痛点是其职能定位问题。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向来观点多元、仁智互见,难以形成通说共识。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加快网上诉讼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网上诉讼程序规则,推动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全程网络化,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诉讼模式,增强诉讼便利性、高效性。”在此基础上,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探索在线诉讼模式”。202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施行;2021年12月,第四次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16条明确规定在线诉讼活动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随着法院系统全面在线诉讼的探索和展开,加之新冠疫情对法院在线诉讼模式的助推,各地“数字法院”“智慧法院”的建设走向深水区,普通法院在广泛进行线上案件审理的同时,亦在探索形成在线诉讼的程序机制。面对此情形,互联网法院的样本作用似在弱化,互联网法院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或将不复存在,专门设立互联网法院的必要性频遭质疑。因此,有必要明晰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厘清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在线诉讼之间的实质界分,以充分彰显互联网法院在我国整个法院版图中所应具有的独特职能与制度价值,使互联网法院真正为数字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转型升级以及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和助力。

<sup>①</sup>有学者对互联网法院做了概念界定,主张互联网法院是指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将网络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送达等诉讼环节在线化,构筑前置化调解、ODR、诉讼等多层级、多元化的解决网络纠纷的专门审判机关。参见自正法:《互联网法院的演进逻辑与功能定位》,《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sup>②</sup>比如英国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以及美国网络庭审的探索等。参见陈旭辉:《互联网法院司法实践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三家互联网法院裁判文书分析的实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关于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的讨论与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因学界关于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地位尚存分歧,故对其职能定位亦存在多种观点。

第一,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在于利用技术手段创新审理机制。该观点认为互联网法院率先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线诉讼模式”<sup>①</sup>,启动了异步审理模式、将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应用于审判执行领域,<sup>②</sup>利用数字技术筛选无需审判的案件、引入电子准备程序,达到了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裁判负担的效果。<sup>③</sup>

第二,互联网法院的独特职能在于其探索试验功能。该观点认为普通法院与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专门法院处理的案件没有超出既定的解纷规则范畴,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层面都有“法”可依,而互联网法院则是面向未来,探索和建构未知的具有创新性的互联网空间治理的实体法律规则 and 在线诉讼程序规则,为立法机关累积素材。<sup>④</sup>

第三,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在于网络社会治理。该观点主张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是解决网络纠纷、便利民众以及探索网络治理新模式,旨在通过建立高效、便捷、专业、低成本的网络纠纷化解机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的专业化和法治化。<sup>⑤</sup>传统的纠纷解决手段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网络治理需求,互联网法院在网络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司法功能。互联网法院作为一个新型治理平台,应当发挥定纷止争、建章立制、价值引导等功能,从关注科技规律转向重视诉讼规则、社会规范,进而实现互联网领域的规范管理,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的互联网秩序管理组织。<sup>⑥</sup>

第四,互联网法院的职能随其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该观点将互联网法院根据职能区分为1.0和2.0两个阶段,1.0时代的互联网法院职能在于探索“网上案件网上审”的规则,2.0时代的互联网法院在网络社会治理中承担网络治理主体整合、网络空间秩序形成和网络规则再造的职能,实现从“网上审理”到“网络治理”的职能转型。<sup>⑦</sup>

在司法实践层面,论及互联网法院的职能,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分管负责人曾于2021年指出:随着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的全面建成以及在线诉讼的全面普及,互联网法院作为互联网司法的先行探索者,其“探索涉网案件的在线诉讼规则”的阶段性工作已基本完成,<sup>⑧</sup>应当转向“依法审理各类新型涉网案件,总结提炼法律规则,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强化我国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一更具挑战性的工作。<sup>⑨</sup>概言之,此种语境下的互联网法院是作为涉网案件在线诉讼规则以及新型涉网案件审理的探索者而存在的,其目的在于为其他普通法院提供一般经验,本质上属于普通法院中的试点法院。

综上,理论界关于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尚未达成共识。实践层面占主流的是互联网法院应采用“技术导向”和“案件导向”并存的双导向模式。<sup>⑩</sup>双导向模式的功能界定在最初阶段促进了互联网法院的设置,但随着互联网司法的纵深推进,普通法院在线诉讼技术日臻成熟并已常态化适用,互

①“双线诉讼”模式,又称为“线上纠纷线上审”模式,是指纠纷发生和诉讼活动两端都在线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单线诉讼”模式,是指“线下纠纷线上审”和“线上纠纷线下审”,只有一端在线上。参见景汉朝:《互联网法院的时代创新与中国贡献》。

②邓恒、王伟:《互联网司法研究:探索、践行与发展——基于考察三家互联网法院的研究进路》,《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③周翠:《互联网法院建设及前景展望》,《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

④段厚省:《论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与程序创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⑤自正法:《互联网法院的演进逻辑与功能定位》。

⑥李占国:《网络社会司法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前景展望》,《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李占国:《互联网司法的概念、特征及发展前瞻》,《法律适用》2021年第3期。

⑦刘哲玮、张弛:《从“网上审理”到“网络治理”:互联网法院职能转型前瞻》,《法律适用》2022年第10期。

⑧李少平:《人民法院互联网司法的建设与发展》,《人民法院报》2021年9月16日,第5版。

⑨2018年《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

⑩“技术导向”模式确立了在线诉讼技术运用在互联网法院工作中的重要角色,“案件导向”模式促使互联网法院将特定案件的审判作为其核心职责。参见吕子逸:《论互联网法院的导向模式与实现路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联网法院的独特功能逐步被消解,运行效用亦随之减损。概言之,“技术导向”模式致使互联网法院缺乏专业定位,稀释了“案件导向”模式下法院的专业审判定位,这是导致互联网法院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在“技术导向”模式下,互联网法院以技术上的高效便民为主要价值追求,被贴上“远程审判”或者“线上诉讼”的标签。该观点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有一定市场。<sup>①</sup> 针对此,有必要对互联网法院在我国法院系统中的应然职能定位进行理论探究,以明晰互联网法院在整个法院版图中存在的独立价值,推动互联网法院的有序运行以及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 三、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模糊的原因

#### (一) 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互联网法院法律地位的确定是正确理解和界定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的前提和基础。杭州互联网法院作为我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是根据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设立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是根据2018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而设立的。我国专门法院的设置程序应当首先被列入中央层面改革规划,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或者委员会)审议或者批准,其次是取得立法上的依据。<sup>②</sup> 然而,互联网法院自设立以来,一直没有宪法、法律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设立决定等法规规范层面的直接依据,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或者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设立方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规定:“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该条款亦未明确规定互联网法院属于专门人民法院。立法层面的现状便为理论层面关于互联网法院属于该款“等内”还是“等外”的讨论提供了争鸣的空间。

关于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地位,理论界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专门法院说。多数学者持该说,认为互联网法院在性质上属于拥有特殊功能的、与普通法院并立共存的专门法院,是“互联网+司法”的产物,其不等同于远程审判,亦不能与“智慧法院”划等号,其本质特征在于跨行政区域管辖,是中国法院设置制度和司法模式的重大创新。<sup>③</sup> 二是普通法院说。该说认为互联网法院是基于信息数据储存媒介的更替而对普通法院作出形式改革的产物,是传统诉讼运行模式的在线化,本质上仍属普通法院。<sup>④</sup> 三是特别法院说。该说认为互联网法院既不同于传统的普通法院,也不同于专门法院,其主要是为应对近年来互联网案件层出不穷的社会形势而设,是在互联网案件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的具有试点性质的特别法院。<sup>⑤</sup> 鉴于互联网法院目前尚存在缺乏明确设立依据且案件管辖范围模糊等突出问题,<sup>⑥</sup>理论界关于其法律地位问题难以达成共识。

<sup>①</sup>于志刚、李怀胜:《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历史意义、司法责任与时代使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

<sup>②</sup>何帆:《新时代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标准和设置模式》,《中国应用法学》2022年第3期。

<sup>③</sup>于志刚、李怀胜:《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历史意义、司法责任与时代使命》;黄明耀:《审级制度改革与法院制度改革的衔接研究》,《法律适用》2018年第15期;洪冬英:《司法如何面向“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法学》2018年第11期;肖建国、庄诗岳:《论互联网法院涉网案件地域管辖规则的构建》,《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杨秀清:《互联网法院定位之回归》,《政法论丛》2019年第5期;段厚省、屠琳舒:《论互联网法院的专门化》,《河北法学》2022年第7期。此外,还有学者表示互联网法院应纳入专业化审判机构的范畴。参见李松杰:《互联网法院是专门人民法院吗——以〈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为中心展开》,《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sup>④</sup>倡化强:《法院的类型、创设权归属及其司法权配置》,《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占善刚、王译:《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机制之检讨》,《江汉论坛》2019年第6期。

<sup>⑤</sup>郝晶晶:《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法律科学》2021年第1期。

<sup>⑥</sup>程琥:《论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3期。

## （二）互联网法院的双导向模式淡化了其专业性

互联网法院的设置和运行呈现出“技术导向”和“案件导向”并存的双导向模式,表现在职能定位上便是互联网法院将在线诉讼技术提升和涉网案件审判共同作为其主要职能,导致“网上案件”与“网上审理”呈现出一种既相互制约又界限不清的模糊状态。<sup>①</sup> 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被界定为可以进行“网上审理”的“网上案件”,即适宜在线审理的涉网案件。这种将涉网案件与在线诉讼技术紧密结合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法院运用网络技术高效快捷地审理案件,但该模式的负面效应随着普通法院在线诉讼技术的全面推广也日益凸显。

互联网法院对在线诉讼技术的过分关注淡化了其专业性。在“技术导向”模式下,互联网法院愈发注重对新兴数字技术和在线诉讼技术的应用,使得重大疑难的涉网纠纷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网络空间出现的新型涉网纠纷难以进入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相反,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大多是案情简单、情节轻微、争议较小的涉网纠纷。如此一来,互联网法院在外部呈现上便是其职能聚焦于对在线诉讼技术的过分强调以及对高效便捷功能的过度追求,而这种外部呈现不可避免地会使互联网法院的运行发展偏离最初设定的轨道,使其与普通法院在线诉讼的发展路径愈发趋同。

实践中全面在线诉讼的实施也已经现实地冲击了互联网法院的专业性。如前所述,2019年《意见》中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加快网上诉讼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网上诉讼程序规则,推动从起诉到执行全程网络化,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诉讼模式。紧随其后,法院系统提出“全面探索在线诉讼模式”的工作任务。2021年《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的出台标志着法院系统事实上已经在全面推行在线诉讼。<sup>②</sup> 随着法院系统全面在线诉讼的广泛推行,各地“数字法院”“智慧法院”的建设不断深化,互联网法院之前区别于普通法院的样本作用正在弱化。与普通法院相比,互联网法院除了能够集中管辖法定特殊类型案件外,仅存在线上诉讼环节的多少与程度差异而已。因此,互联网法院的独特价值或将不复存在,专门设立互联网法院的必要性也备受质疑。

## （三）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未充分体现其专业性

案件管辖范围直接关乎互联网法院的受案数量与质量,而管辖案件的类型直接体现法院的职能定位。因此,通过观察互联网法院管辖案件之类型可以判断其正在发挥的职能作用。实务中,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购物、互联网服务、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作品侵权四类纠纷。<sup>③</sup> 上述案件既非以诉争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进行划分,亦非以事实认定的技术性和专业程度进行划分,而仅因涉案纠纷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发生于互联网空间。<sup>④</sup> 就此而言,与普通法院管辖的案件相比,互联网法院所管辖的案件仅是涉诉法律行为的途径和载体与互联网发生了关联,但涉诉案件的专业性以及适用规则的特殊性并未因活动场景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而存在根本区别,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关系的范畴。加之,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互联网法院规定》)第2条规定的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较窄,诸如算法应用、网络爬虫、直播带货、AI著作权归属等新型网络纠纷尽管具有鲜明的互联网特性,却难以敲开互联网法院的大门,导致互联网法院管辖中真正涉及数字经济运行逻辑与新业态规则的案件不多。此外,互联网法院审理的程序性案件比重过大,当事人主动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案件较

①吕子逸:《论互联网法院的导向模式与实现路径》。

②段厚省:《论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与程序创新》。

③黄磊:《论互联网法院的受案范围改革》,《法律适用》2023年第3期。

④郝晶晶:《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

多,这不仅阻碍其探索涉网案件的诉讼程序规则,<sup>①</sup>还会制约其专业化审判功能的实现。

#### 四、互联网法院的应然职能定位是专业审判

数字技术对司法审判的持续赋能必然会带动互联网法院的自我升级,互联网法院也需要对数字时代的新型纠纷给出确定的规则回应。我国互联网法院自成立以来,已经审理了大量重大典型的涉网案件,探索了诸多诉讼新规,明确了一些互联网行为规范,发挥了一定的专业审判功能。但就审判现状而言,这三家借助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建成的、更侧重“技术导向”模式的互联网法院,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运用互联网数字技术优化程序规则进而提高诉讼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所应承担的对于涉网案件的专业审判职能,模糊了其与同样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展在线诉讼的普通法院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将“互联网法院”等同于“智慧法院”或者“数字法院”,仅将其功能聚焦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便利与缓解法院的审理负担,忽视其对生发于互联网空间的涉网案件的规则创制功能,则有悖于设立该法院时其被赋予的时代使命。<sup>②</sup>

质言之,互联网法院的应然职能定位与其司法功能定位密切相关。有观点认为司法功能分为基础功能和衍生功能,基础功能是促进纠纷妥善解决的裁判功能,而创设规则与维护法律秩序、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等则是由基础功能衍生出来的功能。<sup>③</sup>作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对争议和纠纷事件给予公正裁判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和平。<sup>④</sup>我国人民法院存在的首要价值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裁判,而互联网法院作为法院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概莫能外。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在线诉讼的本质区别应当是互联网法院具有对涉网案件的专业性审判功能,其核心功能应当是专业审判。该职能定位有助于互联网法院摆脱当前审判技术独特性面临消解、案件管辖范围模糊、专业性缺乏等困境,减少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在界分方面产生的争议;有助于互联网法院明确其发展方向,进一步探索涉网纠纷的裁判规则,促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鉴于此,互联网法院应当从更为偏重“技术导向”的双导向模式转向以“案件导向”为中心的一元模式。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其发展至何种程度无法确定,互联网法院探索新规则的目标会持续进行,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脚步也不会停歇,<sup>⑤</sup>而这一高层次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专门化审判体系的建立、专业化审判功能的实现。互联网法院通过对特定类型涉网案件进行专业审判,可以形塑新型案件的实体规则,创新审理新型案件的诉讼规则,强化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及优化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 (一) 专业审判的职能定位符合互联网法院发展的内在逻辑

随着计算机的迅猛普及、网络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智能技术的快速推进,我们正在进入数

---

①陈旭辉:《互联网法院司法实践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三家互联网法院裁判文书分析的实证研究》。

②2017年《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中提出的设立互联网法院的主要目标是“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018年《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中提出的主要目标是“总结推广‘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机制,确保公正、高效、便捷处理各类涉互联网纠纷;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诉讼规则;健全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通过依法审理各类新型涉互联网案件,总结提炼法律规则,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强化我国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③蒋红珍、李学尧:《论司法的原初与衍生功能》,《法学论坛》2004年第2期。

④施新州:《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分析》,《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1期;[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⑤段厚省:《发挥互联网法院“试验田”作用》,《人民法院报》2020年10月24日,第2版。

字智能时代。网络世界的智能化、即时性、虚拟性和无阻隔性使得系争事实均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的涉网民商事案件越来越多,此类案件具有超越物理空间与地域边界之特征,倘若仍然适用现有民诉法规范针对普通案件的地域管辖规则,以物理空间的争议联系点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凭,这不仅会直接影响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互联网法院所应具有的专业化审判职能的实现。<sup>①</sup>

互联网法院并非普通法院的网络版和替代品,而是具有治理领域和司法应对的专门性,<sup>②</sup>其设立目的是产生与普通法院并立的具有独特功能的专门法院,而非仅仅为了实现民事诉讼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sup>③</sup>因此,互联网法院应当具有独立于普通法院的独特功能,实现该功能之路径便是将互联网法院定位为审理特定类型涉网案件的专门法院,而非将所有具有涉网要素的案件全部囊括于其审理范围之内,以彰显互联网法院在审理具有互联网特性的涉网案件时的专业性。进言之,只有澄清互联网法院在性质上属于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才能有效扭转当下互联网法院受案范围模糊任性的窘况,真正打破现行民事诉讼管辖规则对于互联网法院的束缚,为互联网法院专注于互联网裁判规则的形成奠定组织基础和现实条件,进而切实推动互联网法院朝向区别于普通法院的涉网案件审判专业化、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的道路健康发展。

## （二）专业审判的职能定位是互联网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

互联网司法的兴起,不仅是提供一种质效更高的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选项,也是传统司法规律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与发展,其目的是为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提供司法保障。<sup>④</sup>观察互联网法院的运行机制可以看出,其以司法裁判的方式划定虚拟网络空间中相关主体的活动底线和行为规范,敦促虚拟网络世界的秩序形成,为虚拟空间的法律法规完善提供灯塔指引。<sup>⑤</sup>数字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司法的勃兴,一方面提升了互联网法治动态层面的回应能力,面对各种新型数字纠纷,法官需要充分发挥其在解释中发展制定法的能力,给予当事人妥适救济;另一方面,带动了互联网法治静态层面的规则完善,催化了互联网法规秩序的丰富,从实体和程序等各个角度填补了互联网空间的规则不足。由此可见,互联网司法的价值并不仅限于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改进司法、进行司法内部的自我革命,更重要的是通过司法手段进行数字时代的网络空间治理。

互联网法院作为互联网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和直接载体,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sup>⑥</sup>其可以通过个案裁判规范互联网新业态发展、维护公民网上权利、服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推动互联网新技术向善应用。当然,互联网法院对于“案件导向”模式的侧重并非意味着它要从“技术导向”模式的一极走向另一极,对互联网法院定位的纠偏是一种调适而非推倒重来的变革,因为涉网案件的互联网特性决定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可能无视在线诉讼技术的应用。但互联网司法的核心价值在于对互联网领域出现的新型纠纷及时作出司法回应,通过个案审判确立或者完善裁判规则,调整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网络空间的规则之治,促进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因此,技术之治为规则之治提供技术支撑,二者虽有机融合却又有主次之分,“案件导向”模式下规则之治的理想图景才是互联网法治秩序形成的根本路径,单凭技术的完善不可能达至这一目

<sup>①</sup>杨秀清:《互联网法院定位之回归》。

<sup>②</sup>郑旭江:《互联网法院建设对民事诉讼制度的挑战及应对》,《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

<sup>③</sup>肖建国、庄诗岳:《论互联网法院涉网案件地域管辖规则的构建》。

<sup>④</sup>《习近平:抓好各项改革协同发挥改革整体效应 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人民日报》2017年6月27日,第1版。

<sup>⑤</sup>乔文心、余建华:《涉网纠纷化解迈入新时代——杭州互联网法院诞生记》,《人民法院报》2017年8月19日,第7版。

<sup>⑥</sup>吕子逸:《论互联网法院的导向模式与实现路径》。

的,也不可能给予互联网法院以独特性的功能定位。因此,只有将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于专业性司法审判,方可达致互联网司法改革的战略规划与目标期待。

### (三) 专业审判的职能定位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需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公民社会逐渐演变成以数据为纽带的网络社会。<sup>①</sup> 网络治理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国家和社会综合治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互联网法院参与网络治理的重要方式是对涉网案件进行司法裁判。互联网法院基于其因应数字技术发展需求的司法运行模式,不仅适宜在网络空间发挥治理作用,更为网络治理切实提供了有效治理方案:互联网法院通过对涉网案件的个案司法裁判,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弱化或者消解网络法规范碎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还能够对网络空间多元治理主体的在线行为和治理活动发挥规范引领作用。具体而言:

#### 1. 互联网法院通过个案司法裁判能够促进网络法规范的体系化

数字时代的到来诱发了新型网络纠纷风险,而网络世界面临脱法失序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底层规则的缺失。我国网络立法领域虽已取得巨大成绩,互联网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互联网技术创新与现行法律之间依然存在某些冲突,立法层级低、立法碎片化现象依然突出。<sup>②</sup> 比如,规制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规范内容零散、重复甚至“打架”,碎片化问题明显。<sup>③</sup> 网络法规范适用中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现象容易导致治理主体权责不清、执法与司法混乱失序,不利于网络空间的依法治理。当然,网络法规范的碎片化现象沉痾已久,问题错综复杂,其解决需循序而行。作为纠纷解决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审判的介入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网络空间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在线行为的有序化与合秩序”。<sup>④</sup> 当法院不能在“依法裁判”的目标下给出满意的裁判结论,它就必须要在“个案正义”的目标下能动地解释法律,填补网络空间规则无法覆盖的法律漏洞,消弭碎片化的网络治理规则之间的冲突。通过互联网法院消解网络法碎片化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对法院的专业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互联网法院的专业审判应当在对技术规则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既要专注于对涉网案件实体法规则的整体形塑,还要兼顾对涉网案件程序规则的体系整合,从而打破网络法规则适用的碎片化枷锁。唯有如此,方可实现司法裁判尺度的一致性,在规则供给不足时形成对同类案件审理的示范效应。

#### 2. 互联网法院通过个案司法裁判能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空间治理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主要依靠行政监管手段。但若仅采用行政监管单一方式容易导致行政权力过度干预进而压制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这意味着网络空间治理应当在尊重互联网技术发展基本规律和网络社会建设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贯彻包容普惠的基本原则,遵循多元平衡、参与治理、多元共建、公平共享的治理理念。网络生态视域下网络空间多元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网民等。<sup>⑤</sup> 互联网法院可以通过个案司法裁判发挥其“兜底”性网络空间秩序规则的形成作用,这既能对种类繁多的涉网乱象进行规范和治理、对网络空间中多元主体的在线行为和治理活动进行示范和指引,还能有效地串联起其他治理主体,明确各自的治理空间和治理地位,调和治理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打造形成开放、整体、多样、动态的网络空间生态,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网络空间治

<sup>①</sup>刘哲玮、张弛:《从“网上审理”到“网络治理”:互联网法院职能转型前瞻》。

<sup>②</sup>任震宇:《立法层级低、立法碎片化:“互联网+”面临立法挑战》,《中国消费者报》2015年8月14日,第2版。

<sup>③</sup>张新平:《理论与进路:网络平台治理立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78页。

<sup>④</sup>何明升:《中国网络治理的定位及现实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sup>⑤</sup>马长山:《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基于“网约车”合法化进程的法理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理目标的实现。

## 五、互联网法院专业审判职能的实现路径

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意见》将“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推动完善互联网法院管辖”作为重点任务;2021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亦将“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作为重点内容。我国互联网法院是与普通法院并立的具有独特功能的专门法院,其设立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民事诉讼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sup>①</sup>在厘清互联网法院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应当立足于互联网法院的专业审判职能,构建保障该职能实现的具体程序规则和制度设计,以适应数字时代互联网发展之需求,推动我国互联网司法的高质量发展。

### (一) 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

法定法官原则是一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认可的司法原则,该原则是指应当按照法律预先设定的标准确定案件管辖法院和审判法官,且根据标准确定的法院和法官应当是明确的。<sup>②</sup>将法定法官原则适用于法院之设立,便是应当明确规定法院之设立依据,非经法律规定不得就特定案件专门成立特别法院。<sup>③</sup>在我国,涉及法院设立依据的条文主要有《宪法》第3条第3款,《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和第15条第2款,《立法法》第11条。结合现行立法规范,人民法院的设置应当以宪法、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为依据。重大改革应当于法有据,这是新时代政法领域改革所应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互联网法院的设置和运行涉及法院体制体系的宏观设计,针对诉讼规则和实体规则存在诸多填补空白的重大创新,更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权力机关的明确授权。<sup>④</sup>

然而,目前我国三家互联网法院之设立均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杭州互联网法院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后正式成立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是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而设立。概言之,三家互联网法院的设置和运行均没有宪法、法律等法律层面的明确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设立决定为直接依据,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或者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设立方案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应司法解释。此外,2018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亦未将互联网法院如同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那样明确规定为专门人民法院。<sup>⑤</sup>以上因素成为理论界质疑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法律地位的主要原因。

专门法院是为了高效解决某一方向的专业纠纷而设置,旨在实现专业化审判、形成裁判规则,同时可能兼顾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但若只是基于政策需要设立专门法院可能打破政策和法律的平衡,所以专业化审理才是该类法院成立的决定性因素。<sup>⑥</sup>互联网法院的设立目的是将涉网案件从现有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充分运用司法智能化技术打造专业、高效、便捷的新型审判体系,通过运用数量、概率和逻辑来表达和定义善、恶、权利、义务、公正等机器伦理,<sup>⑦</sup>依法妥善处理网络纠纷,推动

①肖建国、庄诗岳:《论互联网法院涉网案件地域管辖规则的构建》。

②谢小剑:《法定法官原则:我国管辖制度改革的新视角》,《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

③郝晶晶:《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

④景汉朝:《互联网法院的时代创新与中国贡献》。

⑤尽管学界不少观点认为互联网法院属于专门法院之范畴,是为《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等”内之内容。

⑥何帆:《新时代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标准和设置模式》。对此,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主张专门法院是基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别审判范式,专业化审判并非专门法院的设立理由,仅是专门法院设立后所要发挥的功能。参见刘强:《论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理由及规范化路径》,《司法改革论评》2019年第2期。

⑦段伟文:《人工智能的道德代码与伦理嵌入》,《光明日报》2017年9月4日,第15版。

互联网司法新规则的形成和制定,助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互联网司法包括“以互联网为手段”和“以互联网为对象”两个层次的司法,互联网法院是两个层次的统一,根本在于“以互联网为对象”的司法。<sup>①</sup> 鉴于此,要实现互联网法院的专业审判职能,首要的是明确其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而这又需要先行解决其立法权源问题,为其专门法院的性质定位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2款规定了专门法院的创设方式:“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置、组织、职权和法官任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尚未对专门法院的创设程序作出细化规定。观察实务中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被确定为专门法院的立法路径,是以中央层面的改革方案为指导,通过会议形成政策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依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做出设置法院的决定,再将其列明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之中。<sup>②</sup>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有必要参照上述逻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形成的政策性文件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最高人民法院的提议作出设置互联网法院的决定,明确其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并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再次修订时将互联网法院明确纳入专门法院之范畴,使互联网法院的设置和运行完全符合程序法定原则,充分发挥其在涉网案件裁判中的专业性,纠正其于实务中偏于智慧法院建设的技术性趋向,从根本上消解理论界对互联网法院是否具有区别于普通法院在线诉讼的独特职能的质疑,增强互联网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 （二）优化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

《互联网法院规定》第2条明确了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采用了“1+1”标准确定管辖法院。首先,根据民诉法规范地域管辖规则确定纠纷属于杭州、北京和广州市法院管辖;其次,根据涉网纠纷的连接点是否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确定纠纷是否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但该标准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比如纠纷中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等连接点适用弹性较大,导致三家互联网法院需要管辖所在市辖区内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所有涉网案件,呈现出受理案件数量过多、同质化程度极高且法律关系简单的特点。如此一来,涉网案件概念的泛化<sup>③</sup>使得互联网法院容易在大量简单案件中消耗过多司法资源。在在线诉讼普及化的当下,互联网法院难以体现其在涉网案件审理上的专业性,也难以有效总结凝练涉网案件尤其是新型、疑难案件的审理规律和程序规则,其运行逻辑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方向。

因此,保障互联网法院实现专业审判职能的首要抓手是其案件管辖范围的厘定。在网络空间司法治理的价值引领下,要科学设定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有必要依据涉案法律关系与互联网结合的紧密程度将涉网案件区分为两种类型<sup>④</sup>:第一类是弱网案件。此类案件是传统法律关系在互联网上的一般性呈现,互联网只是交易实现的手段,其仅在形式上与互联网因素产生最低限度耦合且纠纷规则明确。<sup>⑤</sup> 尽管此类案件发生在网上,可以在线审理,但其互联网特征并不突出。比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网络购物(实体物)合同纠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等。第二类是强网案件。该类案件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因互联网技术介入导致传统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或者表现形式)发生

<sup>①</sup>洪学军:《关于加强数字法治建设的若干思考——以算法、数据、平台治理法治化为视角》,张宏伟、洪学军主编:《数字社会司法治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年,第87页。

<sup>②</sup>谷佳慧:《我国专门法院的发展困境与模式构建:以“地位—功能”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9期。

<sup>③</sup>涉网案件概念的泛化是指只要实体法律关系的产生、存续、实现均以互联网为信息传输载体形式的案件均为涉网案件。

<sup>④</sup>有观点将其区分为“泛网案件”“强网案件”“专网案件”三种类型。参见李占国:《网络社会司法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前景展望》。

<sup>⑤</sup>刘峥:《推进互联网司法建设的四个重点》,《学习时报》2021年10月27日,第2版。

重大变化的案件,即争议的法律关系虽为传统法律关系但其变动的全过程均发生于互联网空间且主要证据亦产生或者储存于互联网空间。比如,网络购物(虚拟财产)纠纷、全流程均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均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的侵权纠纷等。另一种是因互联网技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互联网特性而产生,无法被传统法律关系所涵盖的新型网络案件。<sup>①</sup> 比如,虚拟财产纠纷、网络数据权利纠纷、网络安全纠纷以及算法歧视纠纷等。弱网案件与强网案件这两类涉网纠纷应当根据其性质分别由普通法院和互联网法院管辖。具体而言:

第一,弱网案件应当由普通法院管辖。弱网案件之所以不应由互联网法院管辖,是因为此类案件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一定的互联网因素或者带有一定的互联网色彩,但其所具有的互联网特性并不突出。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网络购物(实体物)合同纠纷和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本质上仅是将传统法律行为从线下物理空间转移到了线上虚拟空间,此种活动场景的改变并未对涉诉法律关系的认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未导致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表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弱网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更有利于真正发挥互联网法院审理网络空间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专业性优势,<sup>②</sup>也能够避免之前因管辖标准不明而引发的诸多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关于案件管辖权的争歧。<sup>③</sup>

第二,强网案件应当由互联网法院管辖。将互联网法院定位为专门法院,该类法院就应当解决普通法院因受专业知识限制而难以解决的涉网纠纷中的专业问题,从而实现与普通法院的优势互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sup>④</sup>否则既无法突显互联网法院独立存在之价值和意义,亦影响互联网法院通过探索网络空间的个案审理规则进而实现包括算法、数据和平台治理在内的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功能。互联网法院运行的基本逻辑是及时对新型互联网纠纷作出权利调整、规则指引,确立和完善互联网领域的裁判规则,实现网络空间的规则之治。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案件原则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全网络空间化。该特点意味着涉诉案件互联网特性突出,主要体现在法律关系全程在线、电子证据相对固定、法律行为整体留痕。<sup>⑤</sup>二是与互联网新业态发展密切相关。该特点主要指涉数字时代产生的涉及互联网平台新业态治理的新型纠纷。比如,数据资源确权、数据权利保护以及算法歧视等纠纷。通过审理具有上述特点的涉网案件,互联网法院可以通过个案司法裁判深入互联网科技的关键领域,把握网络空间活动的运行逻辑;依托专业知识和技术,通过化解涉网纠纷的实体争议与程序难题,推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融入涉网纠纷的化解与网络空间的治理中,确立和完善互联网领域的实体裁判规则和程序运行规则,真正发挥互联网法院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头雁效应”,维护网络空间运行秩序,实现网络空间司法治理的专业化、法治化。

甚至可以想象,未来或许数字时代的人工智能能够基于互联网法院过往受理案件的统计分析,识别出一套分别适合于普通法院在线诉讼和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类型。<sup>⑥</sup>

## 六、结 语

数字社会的主导方向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这些新业态、新模式不仅会引起经济领域的深度改

---

①刘峥:《奋力推进互联网司法行稳致远》,《人民司法》2021年第13期。

②赵琛琛、刘彬华:《互联网案件管辖模式的改革逻辑与范围重塑》,《中国审判》2024年第7期。

③比如,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基于对“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抱持不同解释而形成管辖权争议的案例情形。

④程琥:《论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⑤刘哲玮、张弛:《从“网上审理”到“网络治理”:互联网法院职能转型前瞻》。

⑥[英]理查德·萨斯坎德:《线上法院与未来司法》,何广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80页。

革,也会对国家治理和司法审判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带来新挑战、新机遇。<sup>①</sup>以在线诉讼模式和涉网纠纷化解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法院作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发展潮流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自诞生之初便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局限性。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探索的深入及影响的逐渐扩大,互联网法院的特殊性逐渐被消解,正在遭受来自普通法院在线诉讼常态化适用的冲击与挑战。于此背景下,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的实质界分以及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的厘清,是互联网法院有序运行与价值体现的关键所在。

互联网法院应当是调控涉网活动、维护互联网秩序和建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主导者,在性质上是数字时代互联网与司法深度融合的专门法院,其运行有别于普通法院的技术化、信息化和便捷化改革。因此,要形塑互联网法院的专业性审判职能,确定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为“案件导向”,通过管辖强网案件探索互联网领域的裁判规则,实现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只有坚持互联网法院的专业化审判职能定位,进一步优化涉网纠纷的裁判规则,才能为维护网络安全、促进互联网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提供司法保障,为网络强国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责任编辑:吴 欢)

##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Internet Courts and Its Re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ZHANG Haiyan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internet courts reflec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ith the judiciary in the digital era and is essential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yberspace governance in China. However, as online litigation becomes normalized in traditional court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internet courts is fading. There are two main perspectives on how to position the role of internet courts: a “technology-oriented” approach and a “case-oriented” approach. In practice, the growing dual-orientation model is leading internet courts further from their original function as specialized courts. Contributing to this confusion are factors such as the unclear legal status of internet courts, the impact of the dual-orientation model on their specialization, and the lack of logical consistency in the types of cases they handle. To resolve the ambiguity in their functional role, internet courts should focus on specialized adjudication. This focus aligns with both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 broader trends of judicial reform and cyberspace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Achieving this specialized function requires moving away from the “technology-oriented” model, formally recognizing internet courts as specialized courts, and clarifying and refining their jurisdiction.

**Keywords:** digital age; internet court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specialized adjudication; cyber governance

**About the author:** ZHANG Haiyan,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

<sup>①</sup>马长山:《迈向数字社会的法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年,第281页。